

津门备济社

李杨



津门素称善地,急公好义者众多。近代较为著名者有两人:一人官至吏部文选司主事,辞官后在津经营盐业、钱庄生意。身为儒商,精研阳明之学,以“事能知足心常愜,人到无求品自高”为毕生追求,一生乐善好施,抚恤贫寒孤寡,施舍衣食棺木,被誉为“(粮店后街)李善人”。他正是津门巨子李叔同的父亲——李季珍(1813—1884)。

另一人乃盐商,曾任长芦纲总。喜读先秦儒家经典和北宋五子著作,尤其喜好诵读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,以“信理斯信教,畏天非畏人”为平生夙愿。作为儒商,他对于善事不避劳怨,周恤穷黎,无微不至。在地方赈灾事务中,对于救灾工作人员的食宿、待遇等经费全用自资,不支公款,岁费经常在一万两白银以上。他正是南开系列学校创立者之一严修的父亲——严克宽(1829—1880)。

李、严二人通过德行善举不仅深刻影响了后辈的家国情怀,而且携手创办了天津近代第一家民间综合性慈善组织——备济社。所谓“备济”,就是备荒济贫之意。该社是由天津士绅在1876年创办的以救荒济贫为目的的慈善团体,坐落在粮店街孙家胡同东口南侧,每岁施放钱米、棉衣、医药、棺木,恤贫、立义塾、种牛痘,在清末至民国的天津慈善事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。其建制与沿革在清光绪《重修天津府志》、民国《天津县新志》《天津政俗沿革记》和《天津志略》中均有记载。

备济社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清末民初,天津作为五方杂处之地,津城内外缺衣少食的流民多,同时地理位置特殊,地处九河下梢,发生水灾的概率大。当时防灾体系建设也并不完善,灾害的波及面广,首当其冲的就是数量众多的穷苦百姓。此外,灾民的吃穿住行、灾后疫病防治和重建等,无不需要大量资金。晚清时期政府国库空虚,地方政府救灾捉襟见肘,于是当时上至直隶总督李鸿章,下至天津地方官员丁寿昌、王炳燮等,都在积极劝说士绅出资成立民间慈善组织,来弥补政府职能的缺失,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。再加上天津士绅普遍热心公益,保全桑梓,诚信为公,此时设立一个在非正常时期能够提供物资保障的慈善组织尤为重要,所以备济社应运而生。

清末民初,每到隆冬,天寒闭塞,天津的贫困百姓谋生艰难,于是备济社除了平日恤贫、施药、立义塾、种牛痘之外,还有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冬赈,即冬季救济贫民。每年冬季,备济社都会联合其他慈善社团,走访统计天津城内外困难百姓的生活情况。据《大公报》载,1919年至1920年间,津城贫困户的数量分别是15795户、15349户、17443户,备济社慈善团体向他们发放的玉米面重量分别是188755公斤、160042.5公斤、198567.5公斤,发放棉衣则分别为2349件、1520件、2194件。冬赈工作直到来年春暖河开时结束,历时3个月。备济社分担了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责,极大缓解了贫民在冬季的温饱问题,减少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与贫富对立问题。

备济社的善款来源有二:一是绅捐,就是士绅的慷慨捐助;二是船捐,即从津运输的货船中按货物重量抽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捐助。这一来源有别于一般善款渠道,与天津作为内河与海运枢纽密切相关。自元朝开始,天津就是漕运的重要节点,大批粮食由此转运至北京。清代康熙十六年(1677)长芦盐运使司官署迁至天津,大批盐商聚集津门,使得盐业成为天津的另一大支柱产业。所以往来天津的商船主要是粮船和盐船,船捐也就自然转嫁给了这些粮商和盐商,后来由于贸易业的改变,木料商也加入了船捐队伍。这一类固定税收制度的筹款方式之所以能够获得批准,与备济社成立之初得到官方支持有关。

备济社在资金使用顺序上,以善款利息为第一,每年冬季用30%的利息购买过冬物资分发给贫困群众,剩余70%的利息用于荒年助赈,只可动利不会动本。如果遇到特殊灾年不得不动用本金时,最多动用25%左右的本金。这些举措对于备济社的持久发展是十分必要的。

区别于当时由外省人成立的另一大慈善组织广仁堂,备济社由天津本土人士出资设立。包括前面提到的李季珍、严克宽,还有李士铭、杨俊元、黄世熙、杨云章等人,他们不仅是驰名津门的士绅,而且多为盐商,家资甚富。备济社成立之初,他们捐款总计一万两白银,轮流担任总董,负责备济社的大小事务,在赈灾资金紧张时,甚至会自掏腰包弥补不足。

在漫长的岁月里,备济社经历了庚子事变、辛亥革命等社会运动,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阻力,但最终还是在众士绅的努力下顽强地生存了下来。1925年,备济社与南善堂、北善堂、崇善东社、引善社、公善社、济生社、体仁广生社等七家慈善机构,组建了善堂联合会——“八善堂”。众多社会名流参与到八善堂的慈善事业中,如京剧名家梅兰芳、余叔岩、杨小楼等人进行筹款义演,社会影响较大。1931年出版的《天津市社会局统计汇刊》和1935年出版的《天津市统计年鉴》,都将备济社列为重要慈善组织,纳入官方统计范围。

1949年之后,备济社由国家社会机构所取代,由此暂别历史舞台。2023年初,“备济社志愿服务团队”在李叔同故居纪念馆正式成立,百年组织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
这就是《何处是我朋友的家》



“魔法师”索洛古勃

谷羽

1894年,圣彼得堡杂志《北方通报》第12期刊登了小说《阴影重重》,作者署名费奥多尔·索洛古勃。俄罗斯文学史上有位伯爵叫弗拉基米尔·索洛古勃(1813—1882),是普希金的朋友,也是普希金与人决斗的见证人。“索洛古勃”这个笔名是《北方通报》编辑明斯基帮助作者设想出来的,原本默默无闻的作家,初登首都文坛就引起了读者关注,他厚积薄发,佳作不断,后来竟成了俄罗斯象征派文学的主将之一。

这位作家当时31岁,原名费奥多尔·库兹米奇·捷捷尔尼科夫(1863—1927)。他出身贫寒,父亲是一名裁缝,在他4岁时去世,母亲在贵族家当仆人。费奥多尔不容易毕业于师范学院,随后带着母亲和妹妹到外省乡镇学校教书十年。此间虽然创作了不少童话、诗歌、小说,也曾在外省报刊上发表,却一直鲜为人知。

结识明斯基,改变了年轻作家的命运,《北方通报》连续发表索洛古勃的诗歌、小说。他的作品赢得了读者的青睐,长篇小说《噩梦》《卑劣的魔鬼》(也译《卑劣的小鬼》)更引起了评论界的激烈争论,使得他声名鹊起,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,高尔基、安德烈耶夫、库普林、索洛古勃,成为最受俄罗斯文坛器重的四位小说家。

索洛古勃的创作深受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响,他认为主宰世界的是“恶”,人与人的关系是魔鬼,因此,孤独、痛苦、神秘、死亡,是他经常涉及的主题。他喜欢借助象征与魔幻的艺术手法来描绘离奇古怪的故事。索洛古勃自称“病态世纪之子”,他对儿童的孤独、苦闷、绝望、死亡给予高度关注。

一个出身卑微的孩子,小年纪就明白了贫穷与富贵、奴仆与主人之间隔着一道鸿沟。因此他不得不笑脸迎人,即便内心怯懦、寂寞、孤独、惊恐,仍然会佯装笑

脸。微笑,成了他的面具。小说《微笑》,实际上再现了索洛古勃童年的苦难经历。

出身高贵的孩子,同样会陷入孤独、苦闷与凄凉的境地,原因在于父母只顾他们自己的享乐,忽视了对孩子的关爱与陪伴。孩子提出问题,他们不予解答;孩子的心理变化,他们漠不关心;孩子的兴趣爱好,他们不闻不问。因此,遥望星空成了一个孩子的精神寄托,最后,他死在花园里,因为这个孩子幻想:死亡是一种解脱,他终于可以飞往星空了。小说《向着星星》所涉及的主题,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。

索洛古勃经历了日俄战争、第一次世界大战、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,深知战争带来的恐惧和毁灭性的后果。他也写战争,但并非正面直观的描述,而是从另一面着手,写战争带给后方家人的惊恐不安。《三盏灯》写三个女人,将军夫人、她的儿媳和孙女,每个人都在圣像前点燃了一盏长明灯,灯光象征着她们的希望和寄托,在灯光下祈祷,祈求亲人平安。将军夫人的儿子是校官,正在前方指挥作战,孙女的未婚夫也在当兵打



野草的魅力

沈书枝 文并图



附近的一个公园,从前全都是敞开的林地,从前几年开始,慢慢围上了围栏,有些树林下的草地,也把原先的野草翻掉,种上了一丛丛山麦冬。去年夏天,小区里的草坪也无一例外全都被翻过,种上了山麦冬,开得成片的抱茎苦苣菜和点地梅被挖掉。山麦冬不仅沉闷,无甚可看,使生态单一,而且在北方过冬也不是很好,到了初夏,草地上还是一片光秃秃的黄土。而去年开满了大丛丛早开堇菜的草地,在种上山麦冬之后,今年再去寻找,果然就几乎没有了。

不过附近的公园究竟是大,大概是没有精力或金钱把所有的林下草地都翻过来种山麦冬,所以在一些地方还是能看得到成片的野草。初春时是早开堇菜,后来是紫花地丁和斑种草、附地菜、蒲公英,到了春末,已经是抱茎苦苣菜和中华苦苣菜的天下,到处是它们金黄色的小花。

附地菜和斑种草长得比半个月前深了很多,但花已没有那时候多了,相比之下,斑种草更多,上部蓝色的花开着,底部的位置已经结出了小小的果子。

早开堇菜的种子开始成熟,紫花地丁偶尔一见,夏至草的植株也长得老深,唇形科的白色小花围绕茎秆一圈一圈地开着。间杂着地黄紫红色的花,真是美丽,在小区楼后面的草地上,在人们搬进来后的第四年,也出现了它们的踪影。

有时候,在这片绿色、黄色为主的草地上,还能看到小小一片紫色的光,那是什么呢?走过去看,才发现原来是大花野豌豆,花比南方常见的救荒野豌豆要大得多,繁密得多,蓝紫色也明亮得多,带着一点金属质感的色泽。

点地梅也开放着,林下偏僻处偶尔遇见一大丛,伞形花序使它的花看起来有如散落在地上,白得透亮,喉部一圈黄色。点地梅花开到后来慢慢变成粉红色。

蒲公英的小球成熟大半,在林下走着,常常可以看到吹落得只剩光秃秃的秆子,或是被风吹了一半的球球,偶尔还有一两朵黄色的花。

在几棵梧桐树下的土坡上,二月蓝的花瓣已全部垂下来,夏至草、斑种草、抱茎苦苣菜密密麻麻开着,浸满了光的、种类丰富的野草真是太美了。

天津作为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河海码头,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,更为京剧在本地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天津人的豪爽直率以及码头文化形成的独特民风民俗,为京剧注入了豪迈与奔放

的元素。特别是在武戏表演方面,涌现出黄月山、李春来、李吉瑞、薛凤池、尚和玉、高福安、李桂春、何月山、程永龙、赵鹏飞等一批优秀的武生演员,他们将武术与京剧表演有机结合,表演追求火炽、惊险、刚劲,开打套路灵活多样,打斗凌厉勇猛,演唱则尽显豪迈与粗犷,形成了特色鲜明的“津派”武戏艺术风格,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。其中,高福安、李吉瑞、薛凤池三人被誉为“津派武生三泰斗”,他们以各自独特的艺术风

津派文化谭(十一)

津派武生三泰斗

郑莉

格和卓越的表演技巧,共同造就了津派武生艺术的辉煌。

高福安:守正创新,津派武生之翘楚

高福安(1874—1939),字竹轩,祖籍河北省孟村辛店。7岁入山东科班学戏,凭借扎实的功底与不懈努力,以《伐子都》等繁重武戏在津、沪两地剧团声名鹊起。进入民国后,他在天津四大名园(茶园)频繁献艺,跻身当时最受欢迎的武生演员之列。

高福安师法李春来,表演以“猛”“冲”“快”为特点,突出一个“狠”字。动作矫健有力,身法灵活。基本功扎实,技击娴熟,白口唱功,并皆佳妙。尤擅短打戏,刀花枪花如疾风骤雨,令观众目不暇接。戏曲史家徐慕云《看戏六十年》说他“功力之深、跌扑之猛,在当时武生中堪称首屈一指”。

他的拿手戏有《伐子都》《狮子楼》《艳阳楼》《卧虎沟》《长坂坡》《鸳鸯楼》《翠屏山》《莲花湖》《恶虎村》《蜈蚣岭》《界牌关》《武文华》《挑滑车》《金钱豹》及“八大拿”等。尤其擅演《伐子都》,据说此戏李春来后首推高福安,特别是“后金殿”一段最为人称道,有一连三个“虎跳”“加”“前扑”“蹄扑虎”“倒打石虎”“跌筋”等绝活儿。高福安演《金钱豹》堪与俞振庭相媲美,“能跳五只台,非他艺员所能望其项背”。

李吉瑞:唱做双绝,黄派武生之典范

李吉瑞(1868—1938),字星府,号芝祺,河北省新城县(今高碑店市)人。8岁入雄县史家庄小吉利科班,初学老生,后转武生。民国初年入北京玉成班,后拜名武生黄月山为师,专工黄派武生戏。

黄派武生的特点在于武功与唱功并重,既要求演员具备精湛的武术技巧,又要展现出悠扬动听的唱腔和淋漓激昂的念白。李吉瑞的表演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,他嗓音洪亮圆润,音韵铿锵、游刃有余,善唱散板,颇具乃师风范,尤其擅长表达剧中人物苍凉、遒劲、悲壮的情感。在《独木关》中,他以独具特色的武功技巧和神情姿态,细腻刻画出薛礼遭受陷害、落魄患病,却仍不失英雄气度的形象,特别是“病房”一折“在月下惊碎了英雄虎胆”的二黄声腔,凄凉凄清,戏园评论家张肖伦评说“睹李吉瑞之《独木关》,辄增英雄埋没、脾胃再生之叹”。

仗。将军夫人沉稳,孙女开朗,唯独校官的妻子脆弱,整天哭泣。三个人相互安慰,而帮助她们的还有女仆人,每天夜晚两点,她都会起来照看三盏长明灯,安抚仍在祈祷的姑娘,让人感受到普通人的善良。

在索洛古勃笔下,微笑、星空、灯光,种种象征意象,都具有深沉复杂的内涵。

索洛古勃还被人称为“魔法师”,经常写到魔鬼和精灵,展现超自然力带来的种种后果。

在《圣经》传说和民间故事当中,经常会出现妖魔鬼怪和种种神奇变化,有些魔法、幻术、法宝具有超强的法力,引发意想不到的结局。在这一方面,索洛古勃堪称出类拔萃的文学奇才。

《躯壳与魂魄》描写了两个人物,一个工程师和一个小官员。工程师自述在森林里遇见了一个绿色小精灵,送给他一枚护身符:小小的干树叶。这树叶看似不起眼,却具有神奇的催眠能力。正是借助这件宝贝,工程师主宰了小官员的魂魄,让他成为自己的替身,听从他的驱使。凭借这样的魔幻手法,他控制了无数的员工为他效力,他的公司越变越大,他的财富越来越多,他的地位越来越高。而与此同时,却让更多的人丧失灵魂,沦为任由驱使的替身或工具,虽然活着,却无异于行尸走肉。

在索洛古勃笔下,除了有魔力的护身符,还有神奇的魔幻药水。

在中篇小说《小矮人》中,身材矮小的萨拉宁,娶了身材高大的阿格拉娅为妻。路人的好奇、同僚的嘲讽,让萨拉宁的心态失去了平衡,他服服魔幻药水,身材越来越小,先后受到舆论、权力、金钱、亲人的欺凌与伤害。原本平和善良的小官员,被种种恶势力异化为玩物与工具,这再次印证了叔本华的哲学理念:“人们给同类施加痛苦并无其他原因,仅仅是出于恶意。在所有的动物中,唯有有人这么做。”“这个世界沉湎在罪恶之中:野蛮人互相吞食对方,文明人互相欺骗对方。”

当然,索洛古勃的创作虽说神秘,经常出现死亡与绝望的主题,但是幽暗中隐含着星光,绝境中存在着希望。他的小说《芳香的名字》《爷爷和孙子》《不怕冷的男孩儿》,带给读者的都是温暖和光明。

就俄罗斯文学传统而论,索洛古勃继承了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脉,关注穷人,同情被侮辱与被欺凌的人。他的作品流传了一个多世纪,仍然不失感人的情感力量和卓越的艺术风采。

李吉瑞的表演功架规范,长靠短打皆精,展现出柔美而又不失力度的表演风格。《长坂坡》“掩井”一场,一个“四击头”中连做九个“鹞子翻身”,动作干净利落,疾如旋风,令人叫绝。他戏路颇广,代表剧目有《独木关》《骆马湖》《溪皇庄》《殷家堡》《请东灵》《铜网阵》《凤凰山》《剑锋山》《卧虎沟》《连环套》《翠屏山》《四杰村》《刺巴杰》《巴路》《恶虎村》《卖弓》及老生戏《秦琼卖马》《黄金台》《打渔杀家》《官门带》《文昭关》《桑园寄子》等,还曾排演过连台本戏《风尘三侠》《宏碧缘》《粉面金刚》等。

李吉瑞的表演风格质朴自然,没有过多浮华修饰,又不失内在韵味和气度。当时戏评对他的唱腔有所争论,有人认为其唱腔“苦乏韵味,略嫌直野”,也有人赞赏他“嗓儿圆,味儿厚,声中带情,用情唱



声”。他在《独木关》中的唱词“在月下惊碎了英雄虎胆……”风靡一时,几乎成了当时的“流行歌曲”,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。

薛凤池:兼采众长,梨园中的多面手

薛凤池(1882—1921),河北省任丘县(今任丘市)郑州镇人,自幼随父学唱梆子,工老生,后改京剧老生,又改武生,曾在鸣盛和科班学艺,有“十一岁红”之誉。20岁时因变声改习武生,两年后乐入“六场通透”,尤以武场精熟。其间除为演员伴奏外,仍兼习武生,常年不辍。24岁嗓音恢复后重返舞台,以武生兼工老生,一跃成为津派武生代表人物之一。

薛凤池擅长融合各家之长,兼采南派、黄派、李派武生表演特点,长靠短打都堪称一绝,他身手疾速,动作勇猛,耍弄起大刀花、大枪花来风雨不透,满堂生风。剧评家张聊公曾在第一舞台观看薛凤池与李吉瑞合演的《铁公鸡》,直感“真刀舞棒,惊心夺目,使人神气奋兴”。在《四杰村》中,薛凤池扮演余千,能飞身越过四张并排摆放的桌子,动作干净利落。

薛凤池武生,老生技艺均佳,代表剧目有《挑滑车》《长坂坡》《铁公鸡》《白木村》《蝴蝶梦》《恶虎村》《郑州庙》《英雄义》《白水滩》《贾家楼》《五人义》《界牌关》《拿高登》《四平山》《战马超》《神亭岭》《宛宛城》《金雁桥》《对刀步战》《冀州城》《拿谢虎》《收关胜》《殷家堡》,以及武老生戏《定军山》《阳平关》《大闹府》等。

薛凤池的表演成就得到了业界广泛赞誉。《菊部丛刊》“品菊余话”中称赞他“武健绝伦,亦以赤身与白刃相搏擅场”;《梨园往事》《天津名伶小传》等梨园史料也对他艺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,说他“武功特别扎实,扮相也很好”“唱两有评鑫培的味儿”“白手夺刀,靠身扎枪,以赤身与白刃相搏,其间恰不能分寸,能使观者惊骇,拍案叫绝。他恰去弗之也”。

高、李、薛三位武生演员不仅表演技艺精湛,且戏德高尚,极重同行义气,从不争牌夺位。他们为人豪爽,仗义疏财,扶危济困。高福安为人忠厚,好结交朋友,有“梨园孟尝”之称,曾为救被殴打的平民,在火车上痛打日本军官。他筹资建造了第一舞台,并特意留下一间屋子安置落难的英雄豪杰。李吉瑞在主持天津正乐育化会期间,多方筹措资金,帮助有困难的艺人渡过难关。他们三人不仅致力于个人技艺的提升,还大力扶持、奖掖后学,培养了小福安、李桂春、李兰亭、小春来、鲍顺义等一批津派武生传人。

“津派武生三泰斗”高尚的戏德、卓越的艺术造诣以及对京剧传承与创新的努力,为津派武生艺术树立了典范,书写了一代津门武生的传奇。

系列文章“津派文化谭”至此刊发完毕。从下期开始,本专栏将连续刊发陈武先生的系列文章“生活中的鲁迅”。——编者

很多中国观众熟悉伊朗电影《小鞋子》(1997),一双鞋的故事就能让人爱上片中那对有爱有爱的兄妹。但鲜为人知,该片导演马基德·马基迪创作这部作品其实深受10年前一部伊朗电影的影响。那部电影获得了第4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艺术电影奖,在国际影坛打响了伊朗电影的名气——这就是1987年上映的电影《何处是我朋友的家》。

在伊朗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里,一群孩子在课堂上聆听老师讲课。在检查作业的时候,老师发现穆罕德没有完成家庭作业,于是严厉地批评了他,说如若再犯立马开除。老师对学生们强调这是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规矩。放学后,小男孩阿穆德却发现自己把同桌穆罕德的作业本带回了家。听懂了老师在课堂上的教诲,阿穆德明白这作业本就是穆罕德继续听讲的凭证。为了把作业本还给同桌,阿穆德希望母亲和祖父可以施以援手,帮助他带作业本还给同桌,但是均告失败,他只能孤身前往,到对面大山里的村落去寻找同桌,归还作业本。然而,由于不认识同桌的家,他处处碰壁,遭遇了无法想象的艰难险阻……这就是《何处是我朋友的家》所讲述的故事。这部影片也让导演阿巴斯·基亚罗斯塔米在国际影坛一举“出圈”。

当代具有极大影响力的电影学术杂志——法国《电影手册》杂志,在1995年曾制作了一期名为《您是谁?基亚罗斯塔米先生》的特刊,对阿巴斯称赞不已,说他“创造的影像标志着当代电影每年都在登上一个新的台阶”。好莱坞著名导演马丁·斯科塞斯对阿巴斯也有类似的评价:“阿巴斯代表了艺术电影的最高水平。”而令人意外的是,这位日后享誉国际影坛的伊朗导演在小学时期基本没人听说过。阿巴斯曾在一次采访中自曝,童年时期的他患有孤独症,这个病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,大部分患者在儿童时期开始出现社会交往障碍、交流障碍,以及明显的行为刻板与重复行为方式。阿巴斯说自己从上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,没跟任何人说过话,只是一个人去上学,又一个人回家。

《何处是我朋友的家》:呈现金子般的童心

曹宇田



但不说话不代表阿巴斯没有常人丰富的情感,不说话的他,爱上了文字与绘画,长大以后,他选择用电影来表达自己的情感。

2016年7月4日,阿巴斯因癌症在巴黎去世,享年76岁,法国导演让-吕克·戈达尔闻讯非常悲伤,甚至说出了“电影止于阿巴斯”这样的话,可见他对阿巴斯的极力推崇。阿巴斯生前也对中国充满兴趣,曾在2015年接受中方邀请,拍摄电影《杭州之恋》,只可惜他已去世,不知这部作品能否再和观众见面。

在《何处是我朋友的家》中,小男孩阿穆德能否克服重重困难,找到同桌的家并还给他作业本?如果没找到,他又该怎么做?让我们一起观赏影片寻找答案。

9月14日22:22 CCTV—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《何处是我朋友的家》,9月15日15:45“佳片有约”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。

